



费孝通

## 人文世界的“和而不同”

《人文世界》编辑委员会在出版之前，约我写一篇简短的笔谈，就“人类学与中国二十一世纪”这么一个广泛的主题说说自己的看法，我欣然接受了这项邀请。据编辑委员会的定义，《人文世界》将是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年刊。“年刊”又约我来担任它的学术指导。我年龄已过九十，手头掌握的“时间资源”已经有限，因为精力和时间的限制，我能不能胜任这个“学术指导”的工作，我不敢过于乐观。不过，在新的世纪刚刚到来的时候，我看到人类学界的同人有这份决心来创办这项事业，为学科确立一个专门的论坛，不能不感到兴奋。

我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随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人类学，而在我个人的研究实践当中，一直努力将所学的有关这门学科和其他门类的知识与中国实际的社会变迁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对我有一点了解的人可能会知道，我曾多次在国际上获得人类学方面的奖励，实在受之有愧。但我承认，自己在六十多年来的研究和实践当中，确实与这门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过去十多年来，我发表了一些文章，表述了我个人学习人类学的体会及对这门学科的发展怀有的期待。进入新世纪的门槛，重新回顾一下谈论过的那些问题，我最近又深深地感到，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很不同的时代。我的老师马林诺斯基开始他的人类学研究时，世界上各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没有那么密切，他还能够西太平

洋找到著名的世外桃源式的特洛布里安德岛。我六十多年前到伦敦留学的时候，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开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马老师自己面对这些变化，意识到那个时代西方文化显然已在实现其世界性的扩张，而引起非西方人民的文化自我意识兴起。他后来在《文化动态论》中表示，这个世界已是一个文化接触频繁、矛盾重重的世界，给现代人类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六十多年以后，再来看看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我个人更是感触无穷。

马林诺斯基在他后期著作《文化动态论》中初步总结的看法，预示着一个文化多元世界的确立。在我个人的生涯中，也在中国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大转变，我用“三级两跳”这个概念来形容 20 世纪中国的这一系列变化。在马老师逝世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确实促成了不同人文类型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有不少学者用“全球化”这个概念来概括新时代人类群体和文化之间发生的交流和融合现象。我能够同意，世界性的交互影响正在给人类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我们如还没有更恰当的词汇来描述这些变化，“全球化”这个词暂时还是有意义的。不过，倘若我们简单地相信“全球化”正在造就一个“文化一体的世界”(one-world culture)那就有些操之过急了。例如，经历了“三级两跳”的中国，诚然在科学技术、经济等方面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更频繁、共通之处更多了，但我们的老祖宗经过几千年积累的文化遗产不见得会随着这种“全球化”的发展而全部消失。相反，现在的实际情况恐怕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正在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所承认。一些了解西方现代文明之缺陷的西方学者，更呼吁要与中国展开跨文化的对话，试图从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当中来寻找解决西方现代文明内在矛盾的方案。而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性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交往的日益加深，中华民族的儿女会更多地感受到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肯定和认同。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文化之间表现出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有别的纷繁复杂的现象，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在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中，世界各地的人类学，曾经遭受诸如帝国主义之类的观念的制约，也曾经因为学术洞察力的不足，而与现实世界之间构成某种本来不该有的距离。然而，像马林诺斯基老师那样伟大的人类学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值得珍惜的财富。在最近几次有关文化问题的发言中，我用“和而不同”这四个字来概括我国文化研究过

程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也用这四个字来展望人文世界在 21 世纪的可能面貌。这四个字不是我个人的发明，而是我国文化的遗产，隐藏着我个人对于百年来人类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诸多努力的一个总结，也隐藏着我对人文世界历史和未来走向的基本盼望。倘若我对未来人类学研究有什么期待的话，那么，这四个字或许还能够比较贴切地表明我老来的看法。这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既要体现人文世界的实际面貌，同时又必须为人类群体之间相互依存提出一套值得追求的方向。

我提出的这一方向，针对的首先是人类学者在跨文化对话中本应扮演的角色，也包含我几年前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的“文化自觉”的使命。说得具体一点，我觉得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建设十分重要，这是因为这门学科承担着为人类了解自身的文化、认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及为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处之道提供知识和见解的使命。对于中国人类学者来说，这一使命感，也一样重要。人类学者可以很轻易地告诉人们，我们关注的正是人文世界的面貌及在其中的人们“和而不同”地相处的逻辑。可是，要真正实现这一认识的目标，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我知道，国内人类学界针对中国城乡社区展开的实地研究，已经有相当重要的积累，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及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那些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挑战的小型族群中展开的调查，更发现了令人触目惊心、令人深思的现象和资料。对于中国文化展开的历史和理论探讨，还提出了一些有助于促成“和而不同”的世界格局的例证。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充分肯定的成绩。但是，我们有多少真正能够揭示我国人文世界的本来面目的研究成果呢？另外，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复杂原因，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者迄今为止还很少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境外的各民族和文化。如果这有情可原，那么，就境内社区、文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来说，我们又有多少成果达到我上面讲的那一使命呢？之所以有这些问题，原因必定是很多、很复杂的，也不是我们一时能轻易理清的。我说过，我们的社会科学学科底子还很薄弱。在过去二十年中，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学科建制，在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速成”的。针对社会学学科存在的这个问题我曾经提出“补课”的看法。看来，“补课”的提法对人类学也适用。因而，我希望《人文世界》除了在强调学科知识的增进及人文价值的重新确立以外，还应当在这门学科的“补课”上多做一些工作。

宋蜀华

## 中国人类学如何面向 21 世纪

21 世纪已经来临。面对新的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前景、它的研究取向，必须放置于世界格局中去审视。当代人类学是世界性的科学，然而从历史角度看，它和其他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一样产生于欧洲并首先出现于欧洲的大学体系中，应当说先天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把东方和非西方作为它的对立面。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人类学得到了全球性的传播。可以说，它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是欧洲人面对有关问题而寻求的解决之道。人类学传统上主张研究异文化，所谓异文化实即非西方文化。它的各种理论，则是西方人对非西方文化进行阐释和分析的框架。

今天我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东西方二元一体——更直率地说，二元对立的世界。在西方世界，许多人总企图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人，他们对非西方文化的日益发展感到不安，美国著名政治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及其在科索沃的实践，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他甚至在文章中把中国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最大敌人。面对这样的世界格局，中国的人类学应当如何发展呢？

由于中国的人类学也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中国人类学者在研究方面不免受到西方理论范式的影响，甚至以它为依归。此种情况在有些地方尤甚。台湾的一位学者指出：“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和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序言）鉴于此，一些港台学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主张，并为此而努力。吴文藻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便提出了中国化的问题。所谓中国化就是本土化。本土化在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可以说这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人类学中国化

的目的并非采取自我文化封闭的研究取向，并非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而在于摆脱西方学术垄断，系统地建构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带有中国特点的理论和方法论，并用之于实践。这在今日世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流派各有其理论和方法论，各有立论和见解。对此，我们应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理性的批判，以消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对于西方人类学在田野工作中总结出的调查研究方法如社区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以及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等，对我们都是有用的，但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西方传统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一般说来，多从研究一些非西方的比较后进的，且自身无文字记载的历史，甚至是地域范围有限、生态环境单一的岛屿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往往注重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纵向的历史探索，甚至有非历史的倾向。这与中国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则是地域辽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悠久而且是王朝代兴、民族众多、关系复杂、社会发展不平衡而又生态环境差异极大的社会。虽然有的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但邻近有文字的民族或汉族一般都有对他们的记述。而且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互相接触和影响，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因此，要对它进行人类学研究，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有必要去认真探索了。

按照我的一点认识，针对我国民族社会的上述特点，同时还应看到民族及其文化都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在研究上必须持动态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在方法上要注意到几个方面的“结合”。第一，纵横研究相结合（纵深探索与横向剖析的关系），即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探索和横向剖析，亦即公式研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第二，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局部探讨与整体认识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有助于后者研究的深化。二者密切结合才有助于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第三，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与生态环境研究相结合（文化类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各民族在适应和改造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因而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发展的研究，必须和其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的研究结合起来。第四，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研究相结合（文化变迁与民族交往的关系），我国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和密切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民族及其文化必须考虑到这种民族关

系。以上几种方法都离不开纵与横、时与空相结合的观点，在实践中是有其一定作用的。此外，一个学科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但同时也就带来研究上的局限性，从而跨学科协作研究（互补关系）也是必要的。

总之，面对今天的世界格局，人类学的中国化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自从吴文藻先生提出来后，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作出了贡献，现在中国人类学者正在继续努力。这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建出新的理论与方法论，则不仅是单向的中国化，且可对国外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提供经验。今天，我国的西部大开发给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是人类学者为各民族服务的良机，同时也可在工作实践中发展和完善人类学的中国化。

乐黛云

## 从跨文化对话看人类学的 21 世纪

首先，我要祝贺中国人类学会学术委员会《人文世界》杂志的创办。人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已经有了近一百年的历史，但国内迄今为止还没有专业的学术杂志。从出版设计来看，《人文世界》虽然是“年刊”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本“年刊”应该充当中国人类学专业杂志的角色，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个人并非是人类学专业出身，我从比较文学研究，走到比较文化研究，再走到与人类学一致的“跨文化对话”研究。从我个人研究的经历，我看到人类学是一门值得我们大家来爱护和重视的学科。按我的理解，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注重的是“他者文化”的研究，也就是要通过对别的民族的文化探究，来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一研究的宗旨，与我近年在跨文化对话的研究当中试图推动的事业不谋而合。我认为，近年在海内外逐步得到关注的跨文化对话，对于这个被认为在逐渐“全球化”的世界的认识，对于“和而不同”的世界观的构

建，将有着难以低估的贡献。跨文化对话既强调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又强调对不同文化之间交流和对话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透彻的阐述。这一事业的追求，不在于发现文化之间共通的“规律”，而在于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多种可能性。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长期以来致力于解释不同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变迁，致力于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智慧”，这与我理解中的跨文化对话有着同样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人类学者也十分强调这种文化之间的跨越，无非我们更注重国内大小传统、大小民族之间空间距离的跨越，而西方人类学则更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文化的跨越。而我个人认为，中国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之间是可以互通有无的。这种互通有无，现在被一些学者称为“知识的互惠”。我同意这种叫法，也从中看到了发展的希望。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我觉得国内区域和族群文化的“跨文化研究”，仍然必须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这是因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不能忽视它的特定民族环境和学术条件。不过，我也觉得，倘若我们的人类学学科要真正对于“和而不同”的世界的构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我们便需要更多的人类学家来关怀文化之间对话的模式的研究。我自己的做法是基于历史传承的理解展开我们与海外文化之间的对话。这样一种做法，对于人类学研究会有什么样的参考价值，我不敢武断地加以定义。我能够强调的无非是 21 世纪将是文化之间交流频繁的世纪，在这种频繁的交流中，肯定还会发生历史上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不同学科共同努力，在这种共同努力中，人类学者应当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我希望《人文世界》杂志除了发表人类学专业论著之外，还应多注重这一方面的工作。

陈国强

## 迎接 21 世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新时代

人类学是一门“革新者的科学”，是寻求人类“文化自觉”之路的科学，是一门研究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决策性社会人文科学。人类学自 19 世纪中期诞生

以来,在 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20 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到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得到初步发展;而 50 年代至 80 年代以前,虽然人类学相关分科获得发展,但人类学并未得到全面提倡和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得到重新提倡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总体而言,20 世纪中国的人类学走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总结历史,展望未来,中国人类学在 21 世纪的发展,要依靠中国人类学家在如下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首先,要努力地把人类学建设成为我国独立的学科。中国人类学是在 20 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学科,我们在 20 世纪 50 到 70 年代没有全面提倡,只是分科迅速发展。至 1981 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后,才恢复宣传与提倡。所以我们的社会对人类学还很不了解,在学术界对人类学学科的地位与作用,看法也有不同,存在许多模糊的认识。我国的人类学家,应该加强思考,加强调查,加强写作,用专著和科普读物,讲解人类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学术界必须在人类学的地位和作用上逐步取得共识,努力促成人类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建立。必须让人们懂得,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之间虽然有密切、交叉的关系,但是不能互相取代,只有平行发展才是正确道路。

其次,要努力地把人类学建设成为一门在我国社会科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人类学可以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虽然我国在 1949 年以后没有全面地提倡人类学,但其分科却迅速发展。因此,根据我国国情,根据人类学学科综合的特点,我们应该在这些分科中的文化研究方面,多下功夫。

再次,要努力地把人类学建设成为在社会大众中有广泛影响和作用的科学。要通过论著与科普方式,向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进行宣传,让他们了解到人类学在人口、农业、土地利用、商业管理、就业、移民、社团、民族关系、环保、通讯、福利事业、双语制教育、医疗卫生、教育制度研究等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应用价值。我们不仅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而且也要加强应用研究,以促进人类学学科的建设。

20 世纪中国人类学专业机构的建设获得重要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人类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尚不多,主要是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和上海复

巨大学生物系的人类学教研室等。在 1981 年成立了我国从事人类学研究和教学的群众性自愿学术团体“中国人类学学会”。随后，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也成立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进入 90 年代以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也同样更名成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有关院校也成立相关人类学研究机构，另外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及中国影视人类学会也相继成立，等等。这些都说明 20 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机构的建设成果。但是由于专业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还很少，已经建立起来的机构，有的发展基础、学术力量还很薄弱，总体发展还不如人意。

21 世纪中国人类学要加强专业研究机构的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全国的学术领导机构，应该争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并在各省、自治区有条件的科学院或社会科学院内，成立人类学研究所，以此形成一个雄厚的人类学专业研究系统，这是 21 世纪中国人类学获得重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21 世纪中国人类学必须加强专业队伍的建设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在有条件的高校培养人类学专业人才。现在，有的高校已在培养人类学专门人才，但还不够多，还太少。我们应力争在有条件的高校，建立专业、系、所，培养更多的人类学专门人才。要加强国内校际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在培养人类学专业人才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一流的人类学专业队伍，是中国人类学在新世纪发展的必要条件。

21 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教学、研究成就，要贡献出高水准的人类学教材。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交流成果，高校各有关人类学单位，应该统一编写教材、专著，把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结合起来。要贡献出人类学的科学发现，奉献出自己的著作，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在这里，专著应视为翻译外国人类学著作及我国人类学家的著作。此外，还应有计划地编写一些科普作品，供对民众进行人类学基本理论普及和应用参考。

21 世纪应该是中国人类学专业博物馆发展的世纪。现在，在中国博物馆学会高等学校博物馆委员会中，属于人类学的博物馆，只有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一家而已。因此，需要发展、增加一些人类学博物馆，在有条件的地方、高校、单位，尽快尽量多地兴建人类学专科博物馆，推动大众去了解人类学的内容、应

用，促成直观教育之效。

21 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家所面临的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但我相信，只要我国人类学者在 21 世纪进行不懈的努力，就必将迎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 容观冀

# 坚持调查研究锐意创新的好学风

大家都知道 社会文化人类学原来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产儿”。可是 正如四年前一位法国学者指出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社会文化人类学不但“自己那套用来分析非西方社会的参与式调查方法颇可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生出了新枝 结出了大大小小的果实”而且“还朝着长期以来属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地盘进发，与其他社会科学密切联系的人类学获得了新的活力。它如今成为研究西方与非西方社会的有效手段”。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国专家编写并出版的多卷本《非洲通史》，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去重建非洲早期历史便是一个绝好的例证。<sup>2</sup>

最近十多年来，我国不少从事社会文化人类学事业的中青年学者，思路清晰，一再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写出了不少超越前人的佳作，直接为这门富于实践的学科增添光彩。在我国南方，中山大学于 1981 年夏复办了具有传统优势和特色的人类学系，分设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招收人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继续为国家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在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以身作则，把带着问题深入基层、参与观察、立意创新作为自身的操守。近二十年来，他们在岭南地区考古和族群与族群关系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系里的师生对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的研究已广及潮州凤凰村的追踪研究，客家村社群体生计模式的研究，广西柳江县百朋镇诸族群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广州城乡结合部社区研究，广州外来散工以及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移动、社会保障以及澳门的族群与族群关系研究等等，绝大部分的成果已结

集出版和公开发表。此外，我们也看到不少海外学者，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和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发扬人类学倡导的多学科合作与团队精神，冲出单一学科的藩篱，像萧凤霞、科大卫、华英德、弗里德曼等人类学者的研究成果便是最好的注释。他（她）们与国内历史学者携手开展研究，即从无文字的族群社会转向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传统社会，从当代社区延伸到历史和制度上。

有人说 21 世纪是人类学的世纪。去年 7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以都市民族文化维护与相互影响为主题的中期会议期间，我国学者，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提交大会的论文绝大部分是深入田野、调查研究提炼出来的佳作；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检阅了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祖国建设中的作用。

宋代教育家朱熹说过：“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掌握知识并能予以实践，这正好是当今祖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及其工作者的祈望。

预祝《人文世界》成为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界的良师益友。

#### 注 释

1. 详见[法 莫里斯·戈德利耶：《社会人类学产生于西方 就离不开西方吗》原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6 年第一期，收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人类学的趋势》一书。
2. [上沃尔特]丁·基一泽博教授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第一卷《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年 12 月版。

# 主题论文

## 地域文化与世界



##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再生产

——以纳西文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关系为例

翁乃群

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

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变动中的美拉尼西亚（也包括西太平洋的特洛布里安德岛）或非洲的土人。他们已成了全球社会的公民，正在和全球文明相接触。他们实质上正受着多种文化的支配。研究变动中的土人，将使我们不必再用随意猜臆的方法去重构他们在欧洲人入侵前的文化，去追寻一项项基督教信仰和一件件怪异的欧洲人禁忌的来源，而可以直接去看，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怎样正在活动，怎样和他们原有的文化相抵触和冲撞 或是怎样被吸收进入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说 这种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文化传播的过程，正是人类发展上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忽略了这种研究一定会使人类学丧失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马林诺斯基<sup>2</sup>

文化互动与人类自身有着同样长的历史。人类各种文化的发展变化，无一

例外都和各种不同文化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由于全球各国的经济日益被纳入到以美欧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贸易经济大体系中，加上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的突飞猛进与日新月异，使得人、信息、资本、商品、技术、文化和思想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Foster, 1999; Hannerz, 1990; Kearney, 1995; 翁乃群, 1999），因此，各个文化的再生产过程是在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加多元的文化互动背景下进行的，即使是身在滇西北大山深处的纳西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也不例外。

大量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全球化并没有造成世界文化的同质化（Hannerz, 1990; Sahlin, 1999; Watson, 1997; Yan Yunxiang, 1997; 翁乃群, 1999），虽然大众消费（mass consumption）日益成为普遍现象，人们的物质消费和流行文化消费也显出趋同性，但在这些表面的趋同背后却附着许多本土的意义。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性文化互动的加剧，本土文化的再生产也日益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今时代研究一个文化的再生产就不能不将它放到一个多元文化互动网络的背景下加以观察和思考。

许多社会人类学者认为，大众消费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旅游业是大众消费的一个重要内容。云南丽江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成为丽江纳西文化再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和推动力。因此，在当今探讨纳西文化的再生产时，必须将它与旅游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 九十年代东巴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超地域文化背景

在我国，五十个民族的认定是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被认定的五十个民族的历史经历、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地理和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族群内联系的密切程度的千差万别，各民族文化认同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建设不仅没有停止过，反而随着国家的不断现代化而不断加强。改革开放加速了国内外文化的互动，同时也加强了国内各民族的民族自觉。近二十多年来，尤其是 90 年代中以来，国内旅游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各民族文化的互动达到了空前水平，各民族的民族自觉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结果就是重新生产文化“传统”。当然，这种常常被称为“传统复兴”的潮

流是与解放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许多“传统文化”的压制和破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许多地方，这种“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与各种文化互动的加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自觉的提高紧密相联的。

根据丽江市旅游局负责官员介绍，丽江的旅游业是从 1994 年开始起飞的。当年来丽江旅游的游客达到 35 万左右，旅游收入大约为 4 000 万元。在此之前，只有个别少数人来丽江旅游。1995 年，丽江市成立了旅游局。是年，来丽江旅游的游客增长了近两倍，但还不足 100 万人。而 1999 年，全年游客总数达到了 216 万左右。旅游最高峰的 10 月 4 日，一天的游客总数达到 9 700 人。全年的旅游收入达到 10.9 亿元人民币。1998 年，丽江的旅游收入达到整个县 GDP 的 43.2%。1999 年，这个百分比上升到了 53.7%。2000 年 5 月上旬的旅游旺季，每天的游客人数平均都超过了一万多人，最多的一天突破了两万人。值得指出的是，如此大的游客数量的旅游业是发生在其旅游中心区（大研镇）的居民总数还不足 7 万，即使加上周边三个乡（黄山、白沙、金山）的居民也不足 12 万的一个县城地区。另外，除了上述庞大数量的游客外，近年来丽江还涌进了许多被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商机吸引来的全国各地的商人、投资者、打工仔和打工妹。这样大量的不同文化主体或短或长地来到丽江，无疑将丽江纳西文化的再生产置于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互动网络之中。

1999 年 10 月中旬，为推动以旅游业为龙头的丽江地区经济，在云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丽江地方政府举办了国际丽江纳西东巴文化艺术节。除了邀请众多的国内外各界宾客外，艺术节组织者还邀请了近百名纳西东巴参加大会，并请他们进行多种东巴仪式大展演。作为艺术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艺术节期间召开了纳西东巴文化学术研讨会。艺术节开幕仪式是在丽江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上表演了有七千多人参加的、名为“东巴魂”的大型团体歌舞，开幕式还由云南卫视向全球直播。东巴艺术节组委会的宗旨就是要全面展示东巴文化内涵。复兴东巴文化成为当今以纳西精英为主导的纳西文化再生产的主要内容。<sup>3</sup>

作为艺术节学术会与会代表，笔者除了参加学术会外，也参加了艺术节的一些重要仪式活动。会议的第一天上午，组织者在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旁的一个广场和黑龙潭公园文化宫前的一块草地上，同时分别举行了东巴祭风仪式和

祭署仪式。祭风仪式由丽江地区的东巴进行，而祭署仪式由来自中甸白地的东巴进行。许多与会学者、记者和其他宾客观看了他们的仪式表演。由于无法分身，笔者只观看了由中甸来的东巴主持的祭署仪式。整个仪式的表演进行得很顺畅。仪式场周围挤满了与会者和游客，他们中的不少人手持相机和摄像机不断地将仪式拍摄下来。据一些观看祭风仪式的与会者说，祭风仪式的规模比祭署仪式大得多。

在仪式举行期间，天空是晴朗的。到了中午，天气发生了变化，灰黑色的厚云笼罩了大地。就在大型隆重的艺术节开幕仪式开始之前，大雨倾盆而下，气温急剧下降。由于人多，与会者冒雨排队，或打着伞或穿着雨衣，摩肩接踵慢慢地挤入会场，接着走上看台寻找空位入座。与此同时，大雨逐渐停了下来，天由阴转为多云，但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有些寒意。艺术节的开幕式就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在丽江体育场隆重开始。

开幕仪式上，最吸引人的节目就是在省、地领导和贵宾代表分别致开幕辞后，有多达七千多人参加的名为“东巴魂”的大型团体艺术表演。其规模之恢弘，气势之磅礴，都让人赞叹不已。尤其对于只有不到七万人口的大研镇来说，能够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团体艺术表演，其用心力之巨大，是难以让人不为之惊叹的。团体表演的背景不仅包括主席台对面的看台，还包括了看台背后的狮子山。从面对主席台的狮子山上中央，往下铺挂下来一幅宽 6 米、长 240 米，名为《世纪图》的大长画卷。据介绍，该大长画卷是以被认为东巴长画卷的《神路图》为摹本，并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其中去掉了《神路图》中的“地界”而在画卷的最顶部画上了《神路图》中原本没有的、带有红火焰的一轮金太阳，以它替代《神路图》最顶部分的群神坐像。<sup>5</sup>据说画卷的长度和宽度打破了吉尼斯记录。

在铺展《世纪图》长卷的山坡上，还分散有许多装扮成神话中的各种野兽的群众演员。根据大型舞蹈表演情节的进程，后来这些扮成野兽的演员们也从山上直冲下来进入广场参加表演。正对主席台的看台上，则由数千名举着彩色纸翻板的演员，他们根据东巴经书的神话故事，随着表演的进程，连续不断地构成不同的、以东巴图画象形文为表意符号的巨型背景画面，以及用汉字构成的口号。大型表演是以东巴经中关于纳西创世纪神话故事为主线，表现丽江纳西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对以纳西族为主体的丽江各族人民世代和睦相处的美好过

去赞美的同时，也呼唤他们继续团结一致，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众多的纳西创世纪神话中，编创人员选用了蛋生说。整个曲目包括了三段：《生命的赞礼》、《神圣的创造》以及《美丽的家园》。在第一段《生命的赞礼》中，编排者和表演者试图根据自己对东巴神话《崇搬图》的解读，展示该神话故事中所表达的关于天地万物和人类形成的过程。在第二段《神圣的创造》中，他们试图通过自己对东巴经书中《黑白战争》、《鲁搬鲁绕》传说故事的理解，再现纳西先民开天辟地、创造日月、抗击洪水、辛勤劳动、创造生活的历史。而第三段，则是根据编者对东巴经书《创世纪》神话中表达的崇高精神，呼唤丽江各族人民同心共创美丽的家园，奔向光辉的未来（白庚胜，1999年）。

在看台观众席上，除了来自国内外的上千名被邀来参加此次艺术节的宾客外，还有大研镇和周边各乡的居民。在本土居民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近百名头戴五佛冠，身穿鲜艳绸缎长马褂，外套右斜对襟坎肩的东巴（其中包括有一或两位达巴）<sup>6</sup>；他们被安排坐在主席台左侧的看台上。在整个艺术节期间，他们一直是被安排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以示艺术节组织者对他们的尊重。在许多会议中，主持人多次提到他们是纳西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传承者。他们也因此深深感受到未曾有过的荣光，以及自己肩上担负的文化遗产的重任。同时也感受到国家（由地方政府所代表）和人民（由地方纳西精英所代表）对他们的期望。会议期间 其中有 60 位东巴还被授予了“东巴文化传习专家”的聘书。

在相隔七个多月之后的 2000 年 5 月初，在丽江又举办了“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旅游节”。5 月 1 日晚上 在玉龙雪山甘海子的‘东巴王朝’前面的广场 举行了旅游节的开幕仪式。来自昆明的文艺工作者表演了题为“东巴神韵”的大型歌舞。在此期间还举行了“东巴文化与丽江旅游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组织者除了安排学术报告和交流外，还组织与会者观摩纳西乡村民俗旅游活动和东巴仪式及舞蹈表演。

这两次以“东巴文化”命名的促进丽江经济发展、振兴纳西文化的大型活动 实际上是 90 年代末以来，丽江掀起的东巴教文化热的两个高潮。它以经济搭台、文化和学术唱戏的形式进行。一方面，这是对解放以来纳西传统文化遭到压抑甚至破坏的一种反弹；另一方面，它又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外文化交流的加强、民族自觉的提高的结果。90 年代中以来，丽江旅游业的发展促使人们越来越

看重可以作为文化资源的东巴教文化的巨大潜在价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 90 年代末以后，在丽江先后有三所学习东巴教文化的学校成立。首先是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博物馆成立了东巴文化学校；接着，在 1998 年 6 月一些纳西学者在丽江教育学院成立了“丽江纳西文化研习馆”；2000 年 5 月，在一些纳西学者、官员和文人志士的倡议下成立了纳西东巴文化传习院。这些东巴文化学校、传习馆和传习院成立的目的，均为抢救和弘扬濒临衰微的东巴教文化。为此，几位纳西学者还和一所乡村小学合作，在三年级的一个班开展了传授东巴图画象形文字、东巴经文和东巴舞蹈的尝试。据该活动的主持者和学校有关老师介绍，他们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不足一个学年的时间里，这个班的学生掌握了基本的东巴图画象形文字，他们还学会了一些东巴舞蹈，并经常参加表演活动。

近年来，丽江的旅游热改变了丽江人文生态再生产的背景。旅游业已经成为影响丽江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参与丽江人文生态再生产的社会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既有纳西族，也有非纳西族；既有丽江居民，也有外地居民；既有国内人士，也有国外人士。涌进来的游客和商人、投资者、打工仔和打工妹，或主动地或被动地，或积极地或消极地加入到了丽江本土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以本土身份参与再生产被赋予“传统”记号的本土文化（包括旅游人文景观）的社会主体所基于的理念，也已不仅仅限于“本土”的了，而是包括了许许多多外来的理念。

## 近年东巴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多元文化理念的背景

今日走进丽江，人们很容易就会与高大的东巴木制神偶相识。这是近年来当地纳西社会主体继承和弘扬“东巴文化”过程中，为了表现古老的“传统文化”创造出来的新形式。他们将原来通常只有十几厘米高的木制和面制东巴小神偶制成有六七米高的、类似北美印第安人图腾柱的巨大木雕神偶。由此人们不难看到，超地域的文化互动已涉及到被视为纳西“传统原生文化”的东巴文化的再生产过程。

据丽江县政府的一位负责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对笔者的介绍，这种图腾柱